

评职称关键还是看学术上的能力和水平。回到这一点,教师们自然而然会去加强国际交流,因为通过国际交流的途径才可能走在学科的最前沿。

# 海外经历,职称评审“硬杠杠”?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年末,各高校又迎来紧张而繁忙的职称评审。日前,《中国科学报》重点关注了教师职称评审下放高校的相关话题,其中“高校评职称须海外访学经历”这一要求在科学网上引来了网友热议。

在相关报道的评论中,有网友表示:“学校以评职称要挟,来逼迫大家访学。这等于是无海外访学一票否决啊!除了人为设置障碍,浪费教师宝贵的精力、时间,浪费国家大量资金外,毫无益处。”更有网友反映,“单位(职称评定)直接取消了学术方面的要求,还美其名曰‘创新’。”

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高校教师,他们中多数人表示,评职称要求海外访学经历的规定应当取消。那么,现在是否到了取消这一规定的时候了?

## “妻离子散”的一年

这些年,国内某大学副教授张彬成果丰硕。然而,一条学校的规定“评职称须海外访学一年”的要求,却使他陷入了两难。一方面,评职称卡在访学经历上,另一方面,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离不开他。

“大家私底下把海外访学一年的要求,形容为‘妻离子散’。”张彬说。拖家带口海外访学在张彬身上并不现实,学校提供的经费原本就“紧巴巴”,还要自己“贴点儿”,况且孩子尚幼,妻子是中学教师,不大可能和他来一场“说辞就辞的旅行”。

对于学校评职称要求的海外访学经历,上海某“985工程”高校副教授王艳也表示不认同。她的理由很实在,在国内不仅有课题要做,偶尔带一带培训,收入可观。然而,一旦出国访学,学校只提供基本工资,“收入上大打折扣”。

事实上,高校评职称只看重教师是否有海外访学经历,并不在乎教师个人能力是否提高,也不对访学成果做要求。于是,访学者就出现了两类:一类是拖家带口去国外旅行,一类是矢志科研认为出国一年意犹未尽。

前者在一些高校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教师们拖家带口扎堆往美国、澳大利亚等教育水平高且生活水平相对能接受的国家,而愿意去欧洲高消费国家的教师则占少数。

张彬在中科院的同学则属于后者。出国两年半,回国后成果丰硕,他私下和张彬交流:“至少出国两年,才会有实质性的合作或成果。”而这名“学霸”之所以能待两年半之久,前提是未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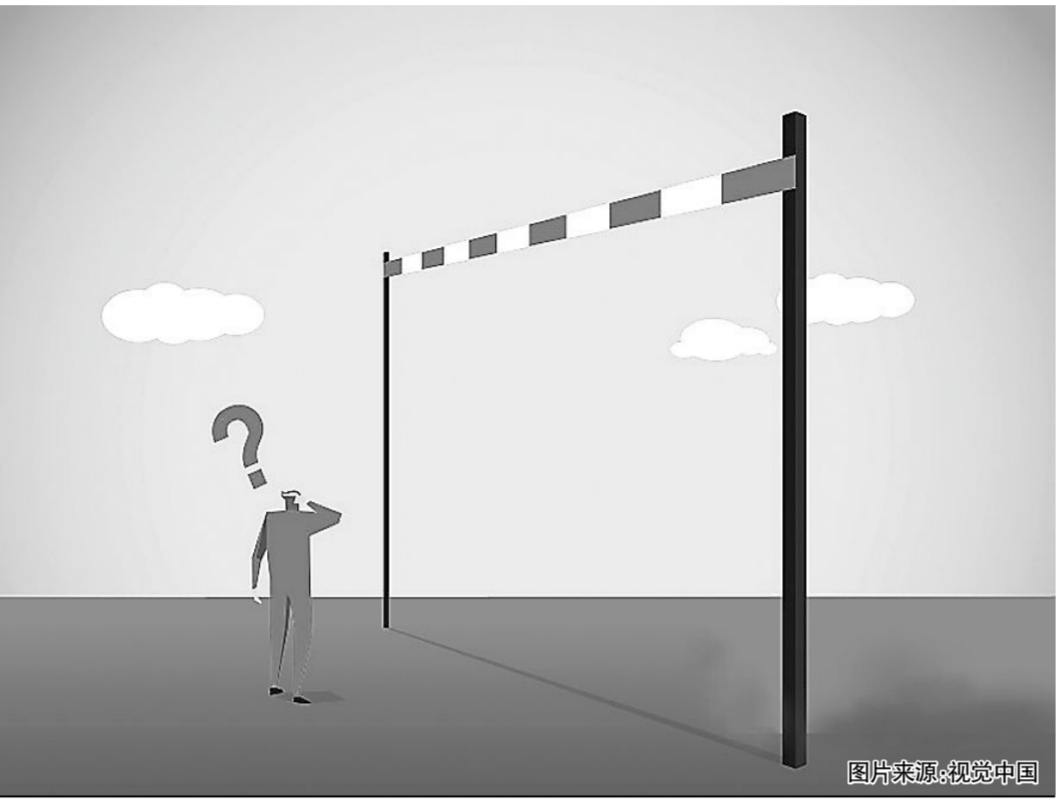
然而,政策上的“一刀切”却使得无论文理工科的教师都陷入了海外访学的各种窘境。

## 何以成为“硬杠杠”

让人费解的是,在教育国际化的今天,教师出国访学已是一件平常事。为什么高校要在职称评审中强调海外访学经历,并在事实上将它作为评职称的“硬杠杠”呢?

“很多地方院校为了学科点的发展,‘逼’着老师们出国。”张彬曾经参与过学科评估材料申报、学科点申报工作,表格里明确要求填写是否有出国经历。如果比例不够,申报就不会成功。

对于张彬所反映的情况,西南交通大学高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教育研究所所长、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中心主任闫月勤表示“的确存在”。

实际上,在她所做的国际化评估中也有同样的观测点——要求教师有一年的海外留学经历,尽管高校不会因为他们所作的评估派教师出国,但“学科点是学校,教师的立身之本,为了保留学位点、完成学科评估,管理部门不会轻易放弃用职称评审驱动教师出国的逻辑,这也是当下高校的无奈之举”。

这一“缺乏高度”的做法,甚至被不少人质疑为,是为了解决一个“过时”的问题。

的确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我国高校招聘的大学教师没有海外留学、交流背景。如今,他们大多40岁左右,俗称“土博”教师,外语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尚可,但与国际人士交流能力欠缺,工作至今尚无海外访学经历。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樊秀娣指出,如今这一问题基本已不存在。随着教师队伍门槛的提高,越来越多高校倾向于招聘“海归”,教师有海外留学背景成为入职的一大条件。科技也在改变传统的学术研究方式,发达的通讯技术使得接收国外最新研究信息以分秒计算,没出国的教师也不是闭目塞听的群体。

“为了评职称去访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办法。随着1977级、1978级老教师退休,教师队伍中‘海归’逐渐占主体,这项政策的生命力最多再持续四五年,就没有必要了。未来高校逐渐向世界一流大学靠拢,不光是招聘‘海归’进入教学单位,

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教授,也不再是为了评职称出国一年,而是纯粹为了科研、教学的需要。”闫月勤说。

## 以成果论职称当呼吁

“仔细琢磨,针对40岁及以上年龄层教师制定这样的要求并无道理,因为评职称对于他们而言,只需要学术水平在本专业领域达到相应的高度,如果该专业并不需要太多海外交流,凭什么用海外经历卡死他的上升通道呢?”樊秀娣质疑。

在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看来,起码本土化很强的学科,如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文等教师并不一定非要有这样的要求。

“职称代表了教师的学术水平,与教师是否有海外经历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采访中,多位受访者表达了这一观点。而海外访学后,大部分人并没有成果产出,高校的投入与产出明显不成正比。

“评职称关键还是看学术上的能力和水平。回到这一点,教师们自然而然会去加强国际交流,因为通过国际交流的途径才可能走在学科的最前沿。”樊秀娣的这一点,也代表了很多教师的心声。

那么,呼吁在职称评审中取消海外经历,就不能只是一撤了之了。

尤小立认为,在职称评审中,所有的经历都要有所淡化,包括拿了多少国家课题、获得了什么级别奖项、有什么样的海外经历。他赞成复旦大学执行的代表作制度,“最有说服力的就是5篇代表作,交给同行评议,以成果的学术价值定职称”。

数线相对低,更容易被好大学录取。如今,东部省份福建也成为“高考移民”目的省份,使得该省近日不得不中止63名“高考移民”者报名资格,让人很是讶异。

毕竟,福建并没有极其丰富的高教资源(“985工程”高校仅厦门大学一所),生源质量在东部省份尚属中等,并没有成为“高考移民”目的省份的特征。

何以出现这一怪相?从网络段子“门门不及格还能上重点”也许可见端倪。段子说的是福建省2017年高考录取一本分数线理科441分、文科489分,远低于其他东部省份,较低的分数线催生了一部分人、一部分教育营销机构动起“高考移民”的念头。

这些人往往是对高考或利用了家长对高考的一知半解。实际上,之所以福建高考录取分数线低,在于该省有大量二本院校按一本分数线录取的专业,随着量的增加,分数线必然要作相应的下调。同时,一本院校的整体录取率还是保持不变。换句话说,高分考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不仅可以报一本院校,也可以报二本院校中的优势专业;高校也从中受益,由于选择权的扩大,二本院校也可以拥有更优质的生源。

其实,搞得如此复杂,不如索性将一本、二本录取批次合并,一本、二本没有分数线,只有一个本科线,打击投机行为,扩大学生选择权自然迎刃而解。

## 教师顺走标本

## 暴露后交出54个塑料袋

日前,南京中山植物园爆出珍贵植物标本丢失,涉事者系山东某高校副教授及两名学生,被发现时已私自取样7袋,还交出了54个同样的空塑料袋。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孔乙己“窃书不算偷”,大概涉事者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偷窃行为,而是为了科研、教学需要,所以“窃标本也不算偷”。顺着这种逻辑,媒体也语带双关地将其表述为“顺走”。

很好奇,涉事者究竟是怎样接受师德教育的?

他指出,如今高校存在拿课题靠走关系等不公平现象,引发了一些争议,导致优秀学者退出大学、科研机构,这无疑是人才流失。一些学者成为了“科研老板”,让博士生、硕士生替自己干活,把科研当作“经营”,导致自身科研水平无法保证。

“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简化职称评审标准。简化之后,不仅更容易操作,而且搞猫腻的机会也少一些。同行评议因执行的是匿名评审,把评议结果向被评审者公开,至少是小范围内公开,彼此之间也无怨言。”尤小立说。

## 粗放型管理须改变

如前文所言,有专家建议海外访学要看成果,教师们又反映成果没有两三年出不了,而现在评职称要求海外访学的经历是一年,一年对于教师们而言已是“离家已久”。那么,产生这一系列连环的矛盾说明了什么?又该如何解决?

“说明了现在的政策没有理解大学的教育理念,高校改革并不关心内容,做了一件事就认定为是改革,不管其结果怎样,让底下人自己‘消化’。”尤小立说。

在这样心态下,“我们看到了国际化的重要,也采取了应对措施,但管理部门的措施太过粗放。”闫月勤指出,教师出国一年,刚刚融入团队,开始共同的研究,尚未深入,在政策的要求下就必须回来,而回来之后高校后续政策没跟上,易使得教师研究就此中断。

她进一步指出,如今高校的后期政策都是“一刀切”,正常的途径应是教师出国之前就有规划,带着目标、任务去访学,回国后高校有相应的评价机制,考察教师在外计划是否完成。而一些教师在海外访学正做得方兴未艾之时,无论是国家,还是学校层面都要有后续政策,经过评估发现支持点,让他们继续留在国外深造或用其他方式帮助他们研究“发育结果”,从而让学校获得最大效益。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防止部分抱着旅游心态的教师把计划定得过低。闫月勤建议,高校须制定科学的机制,总结每年的经验,把管理做得更科学细化。“学院、教研室了解这名即将海外访学的教师的研究水平,教授委员会可以据此提出一个适当的工作量。对不同学术资历的人提出不同要求,能挑战更高的学术目标更好,挑战不了也要完成基本要求。”

除此之外,闫月勤还呼吁,海外访学在形式上要实现多样化。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让教师出国做真实的科研;通过孔子学院,让教师轮流去教学。用实实在在的科研与教学机会促进国际交流,教师在国外继续从事科研或教学,收入上可以保障,对生活中的冲击也更小。

樊秀娣补充,随着国力强大、科研水平提升,未来的国际合作经历应是平等的对话与沟通,不光是我们走出去,还要把国外的“大牛”请进来,用他们国际化的视野辐射实验室乃至学科、学校。如此,才能真正地把国际交流带来的效益扩大。

例如,排名指标中的中年领军专家包括长江学者、国家杰青、重大重点项目包括自科重大、自科重点、社科重大、社科重点,国家重大奖励包括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人文社科奖,人才培养方面的造就学术人才包括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长江特聘、国家杰青。总体而言,这些都是中国目前最高层次的人才、项目和奖项。也就是说,该指标体系注重的是公认的、可比的、高显示度的标志性项目和成果,看重的是水平和质量,而不是一般的项目和成果数量。

在这样的指标体系下做出的排名,不是拼规模、比一般的数量,而是在高水平的基础上比数量,从而反映出各高校各学科的真正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高校师资队伍庞大,但产出高水平成果不多的学科排名靠后,有些师资队伍精干、以质取胜的学科便显示出其优势。这种排名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提升质量和水平是颇有积极意义的,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and 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这种排名尤其值得肯定。

就笔者较熟悉的教育学科而言,2017“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获得第一名的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总分为1271分,处于前1%的百分位段,不仅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学,而且其总分在所有人文社科的一级学科中都是很高的了,这反映出北师大教育学科的强大实力,确实是师范大学和教育学科的排头兵。获得第二名的高校是华东师范大学,总分为682分,处于前5%的百分位段,也是公认的教育学科的领先大学。

## 学生毕业须完成10个马拉松

据媒体爆料,合肥某高校今年的新规,新入学的大学一学生需要在今后四年内完成10个马拉松的跑步距离才可以毕业。一般来说,马拉松全程是42.195公里,10个马拉松就是421.95公里,折算下来,在校学习期间平均每每周跑步两次,每次两千到三千米。

大学生不爱体育锻炼,高校费尽心思把他们拉到运动场,这本不是一件值得反复言说的事。但当看到10个马拉松、每次两千至三千米这样的数字,不禁让很多人直呼“吃不消”,毕竟绝大多数人并不热衷于跑马拉松,也不想成为运动员。

是什么让高校产生制定如此高标准的念头,也许更值得人揣摩。它可能来自于领导的喜好,“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因此,抓锻炼成为了学校育人的重要任务。它也可能来自于高校的攀比心理,各校都在“打卡锻炼”,那么我家标准更高、更强,这就成为值得炫耀的资本。

然而,高校在制定高标准时,是否征询过学生的意见,在学生中做过调查?了解过学生所希望的锻炼方式是什么?跑步最大的公里数又是多少?也许并没有。笔者很好奇,这样不顾个体差异的高标准,究竟能坚持多久。兴许它只是“一阵风”。(温才妃)

## 海峰随笔

10月12日,软科正式发布了2017“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排名榜单一共包括91个一级学科,国内共有453所高校的4756个学科点榜上有名。

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第四次一级学科排名迟迟没有公布的情况下,软科的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是颇有价值的。

在该榜单中,北京大学是在各学科中夺冠次数最多的高校,该校共有12个学科名列榜首。清华大学紧随其后,在11个学科中摘得桂冠。中国人民大学有5个学科排名在全国第一。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也都有优异表现,在4个学科中排名第一。

不同学科的学科点基数不同,因此,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并不相同。有的热门学科,比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参加排名的高校在300个左右,而像特种医学、大气科学这样的小众学科,有此设置的高校数量都不超过20个,海洋科学不超过30个。为此,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引入了百分位段的概念,在绝对数排名以外,还给出了每个学科点在本学科所处的相对位置。所有上榜学科为同类学科的前50%,并根据学科点总数,按照具体位次和1%、5%、10%、25%、50%五个百分位段排序。

根据“最好大学网”的介绍,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的指标体系由软科开发的学科发展水平动态监控系统内嵌的30余项测量指标所组成,这些指标全部都是高校学科建设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密切关注的关键词,代表了该学科点对本学科稀缺资源的占有情况。软科将这30余项指标划分为10余个指标维度分别计算得分,然后归纳为高端人才、科研项目、成果获奖、学术论文、人才培养等5个指标类别,对应10余个指标维度,包括30余项测量指标,最后汇总得到学科点的总分。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的指标数据全部来自第三方数据源,经过软科开发的规范化数据清洗和学科归类流程处理后,统一得到各个学科点的各项指标数据。

软科是全球最早进行世界大学排名的机构,其排名指标体系选取的也都是刚性的、可以检视的指标。就中国最好学科排名而言,所有反映的基本都是机构的硬实力。

例如,排名指标中的中年领军专家包括长江学者、国家杰青、重大重点项目包括自科重大、自科重点、社科重大、社科重点,国家重大奖励包括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人文社科奖,人才培养方面的造就学术人才包括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长江特聘、国家杰青。总体而言,这些都是中国目前最高层次的人才、项目和奖项。也就是说,该指标体系注重的是公认的、可比的、高显示度的标志性项目和成果,看重的是水平和质量,而不是一般的项目和成果数量。

在这样的指标体系下做出的排名,不是拼规模、比一般的数量,而是在高水平的基础上比数量,从而反映出各高校各学科的真正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高校师资队伍庞大,但产出高水平成果不多的学科排名靠后,有些师资队伍精干、以质取胜的学科便显示出其优势。这种排名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提升质量和水平是颇有积极意义的,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and 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这种排名尤其值得肯定。

就笔者较熟悉的教育学科而言,2017“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获得第一名的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总分为1271分,处于前1%的百分位段,不仅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学,而且其总分在所有人文社科的一级学科中都是很高的了,这反映出北师大教育学科的强大实力,确实是师范大学和教育学科的排头兵。获得第二名的高校是华东师范大学,总分为682分,处于前5%的百分位段,也是公认的教育学科的领先大学。

其他处于前5%的高校还包括:第3名西南大学(486分)、第4名东北师范大学(454分)、第5名厦门大学(441分)、第6名南京师范大学(304分)、第7名华中师范大学(304分)。这些学科都是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第三次一级学科排名中,名列前六名的教育学科,这次在中国最好学科排名顺序有所变化,反映出部分高校近年来教育学科实力的升沉变化,也与其排名反映的是重质量、高层次的刚性指标有关。

# 我看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 刘海峰

## 壹月教评

## 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11月1日,在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上,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解析了西南联大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其中他谈到,西南联大云集了四方的名师,他们有着不同的风格、气象,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在校园中相互切磋,彼此尊重,共赴时艰。

西南联大时期存在诸多学派,如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因宣扬“战国时代重演论”而组合的“战国策”派,以及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人物的“魁阁学派”和以陈达、李景汉等为核心人物的“文庙学派”等。

不少教育专家认为,学派之于大学,是在推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大学走向卓越。学派的产生有助于百家争鸣,以及学术争辩的正常开展。古今中外皆是如此。然而,如今谈到学派,在中国高校圈,这个词似乎已经消失了。随着学派的消失,学科内部纯学术讨论的活力也消减,取而代之的是,教师们更热衷于讨论职称、课题、评奖等更加现实的问题。由于学派的缺失,大学丧失特色,缺少大师,不得不说是中国大学之哀。



北京高校安装了“HIV尿液匿名检测包”的自动售卖机。

而对于我国的大学而言,再提学派的高校并不多,在不久前北大第13次党代会上,校方提出“进一步形成中国风格、北大学派,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期待他们能有不俗的表现,成为重振学派的先行者。

## 高校艾滋病检测包

## 一个月卖出37个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从9月27日至11月5日,共10所高校的售卖机共卖出37个艾滋病检测包,其中14个送检,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未感染)。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感染艾滋病者呈上升态势。一个多月卖出37个检测包,为数不少。怀疑自己感染艾滋病,恐惧感背后的无助恐怕是最饱受煎熬的。而这时人也最易产生走向极端甚至报复他人、报复社会的心理,便捷获取的高校检测包无疑缩短了这一焦虑期。近年来,高校从谈艾变色到提供便捷的安全套、检测包,不得不说是观念的进步。

怎样将防艾、正确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的工作,往前再推进一步?或许只是提供这些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让大学生对艾滋病有更多的认知。从去年起,北京市教委要求大学新生入学都要接受防艾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防艾政策滞后的缺陷。然而,作为青春期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性传播,其延伸到高校课堂的性教育课程或其他其他形式的开展却远远不够。期待更多的高校早日重视并解决这一问题。

## 福建中止63名“高考移民”者报名资格

打击“高考移民”这一词汇曾经只专属于中西部省份,因为从东向中西“高考移民”,录取分